

马斯克“百日维新”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机制：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



何斌¹, 龚建桥², 倪钢³, 何其恒⁴, 李泽平^{1,*}

¹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520

²深圳市委党校深圳高级经理研修院 (深圳企业家研修院), 广东深圳 518029

³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东肇庆 511370

⁴广州市八方锦程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 510610

摘要: 商业化变革和技术化变革均是 21 世纪政府治理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其中单一的变革研究比较多, 但二者协同的变革研究比较少。本文通过马斯克的“百日维新”进行单案例研究, 探讨政府的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的赋能作用是籍助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的中间途径来实现的, 它提升了国家治理现代化 (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水平, 而技术化变革 (从嵌入到匹配)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协同作用。因此, 通过市场化改革、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进行商业化变革, 促进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 进而通过技术化变革 (从嵌入到匹配) 的反复协同耦合, 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 商业化变革; 技术化变革; 协同变革; 赋能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

DOI: 10.57237/j.wjeb.2025.02.001

Enabling Mechanism of Musk's "Hundred Days' Reform" for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Synergistic Commerci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He Bin¹, Gong Jianqiao², Ni Gang³, He Qiheng⁴, Li Zeping^{1,*}

¹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20, China

²Shenzhen Party School, Shenzhen Business Executives Institute (Shenzhen Entrepreneur Institute), Shenzhen 518029, China

³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aoqing 511370, China

⁴Guangzhou BafangJincheng Human Resources Co., Ltd, Guangzhou 510610, China

Abstract: Commerci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serve as critical instruments for driving governmental reform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re are many studies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问题求解的知识拓展机制研究” (72071049);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社区心理疤痕的修复路径及其对策研究” (GD23XGL021).

*通信作者: 李泽平, lizeping2004@sina.com

收稿日期: 2025-05-06; 接受日期: 2025-06-24; 在线出版日期: 2025-08-13

<http://www.wjeconbus.com>

on single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but few on the collabo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This paper employs a single-case study of Elon Reeve Musk's "Hundred Days' Reform" (a metaphor for rapid innovation cycles) to explore the enabling mechanisms of synergistic commercialization-technological reform in modernizing state governanc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such synergistic reforms is mediated through adaptive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Specifically, this dual reform elevates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encompass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oncepts, systems, and capacities—while technological reform (progressing from embedding to matching) plays a pivotal synergistic role. Consequently, advancing commercialization reform through marketization,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organizational adjustments fosters adaptive governance. This, in turn, facilitates iterative synergy and coupling with technological reform (from embedding to matching), ultimately propell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Keywords: Commercialization Reform; Technological Reform; Synergistic Reform; Enabling Mechanism;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1 引言

商业化变革和技术化变革是 21 世纪政府治理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前者重在运用商业化逻辑进行政府治理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后者重在运用技术化逻辑（包括技术运用和技术创新）进行政府治理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一个国家运用科学、民主、法治等方式，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和治理，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它一般包含治理理念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商业化变革的赋能作用，也需要技术化变革的协同赋能作用[6-9]，但目前相关的理论研究体系关注较多的是某一方面的赋能作用，即通过商业化变革或技术化变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却较少考虑二者的协同赋能作用及其机制[1-7]。因此，本文聚焦商业化变革和技术化变革的协同效应和协同作用，通过对马斯克的“百日维新”进行单案例分析，拟深入研究政府的商业化和技术化协同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机制。本研究期望从协同赋能作用的视角丰富政府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实践上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治理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启示和借鉴。

2 案例研究的理论基础

与政府治理及其变革相关的主要理论有政府治理理论、政府变革适应性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组织变革理论[8-13]，这些理论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政府

治理及其变革的方式和方法。其中，政府治理是指政府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调控的过程，旨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提供公共服务，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治理变革是指政府为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对治理理念、方式、结构、流程等方面进行的调整与革新。

政府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实现公共目标。善治是政府治理及其变革的重要目标，旨在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其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性和有效性等。新公共管理理论甚至认为应该将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引入政府管理，如注重绩效评估、成本效益分析、竞争机制等，以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主张政府应像企业一样以顾客为导向，满足公众的需求。

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理论是关于政府如何应对环境变化并进行适应性调整和变革的理论。它强调政府治理需要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的治理理念、结构、机制和方式，以提高治理效能，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它认为政府不是静态的组织，而是一个具有适应性的系统，能够通过学习、创新和调整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中国政府执政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其核心内涵包含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它有三个核心理念。一是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改变传统的政府单一主体治理模式，鼓励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国家

治理，形成协同治理的格局。二是注重法治引领：坚持依法治国，强调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治理活动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三是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国家治理的精准性、高效性和科学性，推动治理方式的创新。

组织变革理论是关于组织如何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进行调整和转变的理论体系，包括勒温的三阶段变革理论、系统变革理论和权变理论等内容。其中，勒温的三阶段变革模型指出组织变革包括解冻、变革、再冻结三个阶段。系统变革理论强调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由相互关联的要素（人员、结构、技术、任务）组成，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需要从整体上考虑和设计变革方案，使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以实现组织的整体优化。权变理论认为，组织变革没有固定的模式，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灵活选择变革的方式和策略；组织的结构、领导方式、管理方法等都应与具体的情境相适应，才能提高组织的效能。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选择

案例研究方法是进行理论扩展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它能够深入挖掘实践现象背后的机制和原因，最适合回答“how”和“why”的问题。由于本文研究旨在探究政府的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如何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是关于“how”的问题，所以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此外，相较于多案例研究，单案例研究可以聚焦单一研究对象，提高研究的连贯性和纵深性，有助于提炼出深层次的赋能机制与赋能效应。因此，对相应的赋能机制与赋能效应主题，本文最终选择单案例研究方法以期展开深入的分析。

3.2 案例选择的依据

基于案例抽样原则，在选取案例时要兼顾考虑案例的代表性、典型性和启示性。

马斯克的“百日维新”是 2025 年初他主导的美国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改革[14]。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长期存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问题，且国债高企，财政压力巨大，

这是“百日维新”的背景。DOGE 的主要职责是从政府外部提供意见与指导，与白宫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合作，为拆解政府官僚机构铺平道路，削减多余的监管法规和浪费的开支，并重组联邦机构。马斯克作为特斯拉和 SpaceX 等企业的掌舵者，以其商业思维和创新的能力，被寄予厚望来推动政府改革。马斯克承诺在百日内为美国节省 1 万亿美元政府支出，试图通过改革提高政府效率，减少浪费和欺诈行为。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行政机构精简与裁员、审查敏感数据与系统和数字化与自动化改革。这些改革引发了诸多争议。比如，教育部裁撤导致 200 万份学生贷款积压，偏远地区邮政服务延迟率达 37%；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面临 19 项联邦诉讼，包括违宪等指控；部分裁撤的联邦机构雇员反应激烈，华盛顿街头出现针对马斯克的游行示威，其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马斯克因面临巨大压力和阻力，宣布计划于 2025 年 5 月辞去美国政府效率部的职务。他的改革虽取得部分效率提升，但也暴露了技术官僚与政治体制的深层冲突。

因此，从代表性、典型性和启示性三个评价标准来看，马斯克“百日维新”是一场以技术官僚思维重构政府治理系统的、疾风暴雨式的激进社会实验，为政府治理及其变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观察样本。

3.3 数据和资料来源

基于三角验证原则，本研究囊括了丰富的、二手的网络媒体多源数据和资料，来源包括百度、微博、微信、抖音视频、小红书、报纸、新闻、期刊文献、书籍著作等，这些多来源、多渠道的数据和资料保证了研究的相互补充性和可验证性。

4 案例分析与讨论

结合马斯克“百日维新”的变革，研究发现，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或影响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政府商业化变革的行动阶段、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阶段、技术变革（从嵌入到匹配）与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的协同耦合阶段。

4.1 政府商业化变革的行动

马斯克的“百日维新”本质上是用商业化逻辑对政治生态的一场暴力解构，它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三个方面来设计政府商业化变革行动

策略的[14]。

4.1.1 市场化改革

政府的市场化改革一般是指将市场机制引入政府管理，以提高政府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马斯克“百日维新”的市场化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 (1) 行政机构市场化改革。特朗普启用马斯克组建政府效率部（DOGE），本质是将硅谷的“闪电裁员”移植到联邦政府。马斯克团队以人工智能的方式筛查公务员绩效数据，仅 2025 年 2 月就裁撤了环保署 388 人、疾控中心 1300 人和国税局数千人，并计划关闭美国之音等机构。这种“19 岁冲锋队员+算法”的模式，完全绕过了公务员保护法案，将联邦雇员转化为随时可清除的“人力资源冗余”。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强调，要进行“手术刀式的调整”，实则默许了马斯克以“斧头”开路的模式。例如，当农业部抵制裁员时，DOGE 直接公开了该部门 70%员工日均工作时长不足 3 小时的数据报告，引发了舆论的倒逼。
- (2) 审查敏感数据与系统。获取财政部、教育部、能源部等机构的系统访问权限，分析纳税人记录、社保信息等数据，以识别低效支出。
- (3) 数字化与自动化改革。缩短 NASA 火箭发射审批周期，从 18 个月压缩至 112 天，灾害救援审批时间从 11 个月降至 6 周，并建立实施医疗欺诈识别系统，拦截 220 亿美元欺诈资金。开发财政健康监测系统和 AI 审计官，实时追踪预算执行效率，将项目评估周期从数月缩短到数小时。整合国防部、财政部等 23 个机构数据库，消除重复采购，仅在医疗设备采购领域节省 18 亿美元。

政府市场化改革的意义一般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促使服务提供者不断改进服务，可以满足公众多样化的需求。其次，提升政府效率。绩效管理等措施有助于明确政府部门职责，减少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第三，优化资源配置。市场机制能更有效地将资源分配到最需要和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避免资源浪费。第四，促进经济发展。放松规制等市场化改革举措为企业创造了更有利的发展环境，推动经济增长

和创新。

4.1.2 制度改革

马斯克在担任美国“政府效率部”负责人推行的“百日维新”中，进行了以下制度改革：

- (1) 行政制度改革。首先，进行行政机构精简。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联邦教育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机构，减少政府层级，提高行政效率。其次，通过裁员进行人员调整。通过多种方式裁减大量联邦雇员，节省人力成本。直接裁减约 3 万名联邦雇员，推动 7.5 万名公务员接受买断离职计划。
- (2) 数据与审查制度改革。首先，开展数据审查。获取财政部、教育部、能源部等机构的系统访问权限，分析纳税人记录、社保信息等数据，以识别低效支出，加强对政府资金使用的监管。其次，开展项目审查。建立实施医疗欺诈识别系统，拦截欺诈资金；开发财政健康监测系统和 AI 审计官，实时追踪预算执行效率，缩短项目评估周期。
- (3) 技术制度改革。首先，进行审批流程优化。缩短 NASA 火箭发射审批周期，压缩灾害救援审批时间，提高政府对紧急事务和重要项目的响应速度。其次，进行数据库整合。整合国防部、财政部等 23 个机构数据库，消除重复采购，降低政府运营成本。

4.1.3 机构改革

马斯克在担任美国“政府效率部”负责人推行“百日维新”期间，进行的机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1) 关闭部分行政机构。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联邦教育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机构，以精简政府架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层级和行政开支。
- (2) 大规模裁员。直接裁减约 3 万名联邦雇员，并推动 7.5 万名公务员接受买断离职计划。通过发送全员邮件要求联邦雇员提交周报自证价值，未回复者视为自动离职，最终约 4 万人主动辞职，节省了约 1000 亿美元的人力成本。
- (3) 取消相关合同和项目。取消与多元、平等与共融（DEI）相关的合同，终止 32 项 DEI 培训项目，节省超 10 亿美元。

一般地，政府管理的市场化改革试图解决政府管

理效率和公共服务管理质量问题，制度改革试图解决政府管理制度机制问题，而机构改革试图解决政府组织机制问题。然而，马斯克的“百日维新”由于过于激进、加之时间又短，引发了诸多传导效应和连带问题。比如，教育部裁撤导致 200 万份学生贷款积压，偏远地区邮政服务延迟率达 37%。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还面临 19 项联邦诉讼，包括违宪、违反《隐私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指控。最终，迫于各种压力，马斯克宣布 2025 年 5 月结束其百天左右的官方任职生涯。

4.2 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

根据美国联邦政府治理的素材，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一般是指政府为了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的治理理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以提高治理效能，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具体的变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见图 1）。

- (1) 治理理念变革。随着时代发展，政府逐渐从传统的治理理念向更注重服务、绩效和结果的现代治理理念转变，强调以公民为中心，进行合作共治，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 (2) 治理体制机制变革。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

配置，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执行效率；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参与治理。

- (3) 治理方式方法变革。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和智能化水平；采用协商、对话、合作等柔性治理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提高治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提升政府治理效率。从技术手段来看，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可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数据处理和分析；从商业策略来看，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能依据市场规律和利益驱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其次，增强政府治理的适应性。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使得政府既能利用技术的创新性和灵活性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和问题，又能借助商业的成熟模式和经验确保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第三，促进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鼓励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主体参与，打破部门或领域之间的壁垒，实现权力和资源的共享与协同，促进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提高了决策科学性和执行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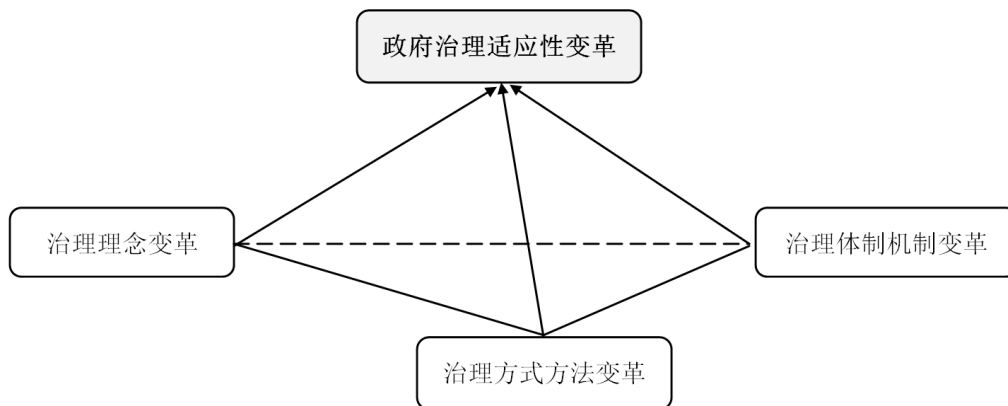


图 1 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的结构

因此，“治理理念变革”为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提供了理念基础，“治理体制机制变革”为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提供了体制机制支撑，“治理方式方法变革”为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提供了方式方法保证。

4.3 技术化变革与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的协同耦合

马斯克“百日维新”中，技术化变革就是以马斯克为

核心的技术官僚们运用技术手段对美国政府进行的一系列改革[14]。具体举措主要有三个方面。(1)利用 AI 技术分析开支。用 AI 算法分析政府开支，建立“荒唐支出排行榜”，发动全民监督。(2)将企业技术与管理模式引入政府。将 SpaceX 的火箭回收技术应用于政府采购流程优化，用特斯拉的电池管理思维来管理国家财政，把特斯拉“扁平化组织”模式引入联邦政府。(3)组建技术精英团队。搭建“精英技术组”，成员多来自科技初创公司，平均年龄仅 23 岁。他们绕开议会审核，直

接调取政府部门核心数据，以推动改革。

一般地，随着技术化变革与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的协同耦合，从浅层的嵌入到深度的匹配，政府商业化变革对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的影响作用也在不断加深，具体体现在三个现代化的促进，即促进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促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及促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首先，促进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具体包含以下三大理念。首先，以民为本的理念。把公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公民根本利益作为国家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公民在国家治理中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其次，创新发展的理念。不断推动治理理念、方式、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社会变化的趋势，提高国家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三，协同共治的理念。树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理念，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主体的作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共同推动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

其次，促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体内涵主要有两点。首先，制度体系完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国家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其次，组织架构优化。完善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提升各类组织的协同性和运行效率，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治理指令有效传递和执行。

第三，促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首先，决策科学化。运用科学的方法、技术和手段（包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收集信息，充分听取各方意见，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前瞻性和可行性，避免决策失误。其次，执行高效化。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能够准确理解和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和决策部署，具备强大的执行力和落实能力，确保政策措施能够及时、有效地落地实施，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成效。第三，监督法治化。建立健全监督体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监督，确保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保障治理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

因此，从以上分析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实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现代化，一是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二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三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完成这三个方面的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才能达到整体的高度和效果。

综合以上三个阶段的逻辑分析，可得到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机制模型（见图 2）。该机制模型表明，政府商业化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赋能作用是藉助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的中间途径来实现的，技术化变革（从嵌入到匹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协同作用。首先，政府商业化变革通过市场化改革、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促成了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从治理理念变革、治理体制机制变革和治理方式方法变革三个层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接着，通过技术变革（从嵌入到匹配）与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的不断协同耦合，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水平，最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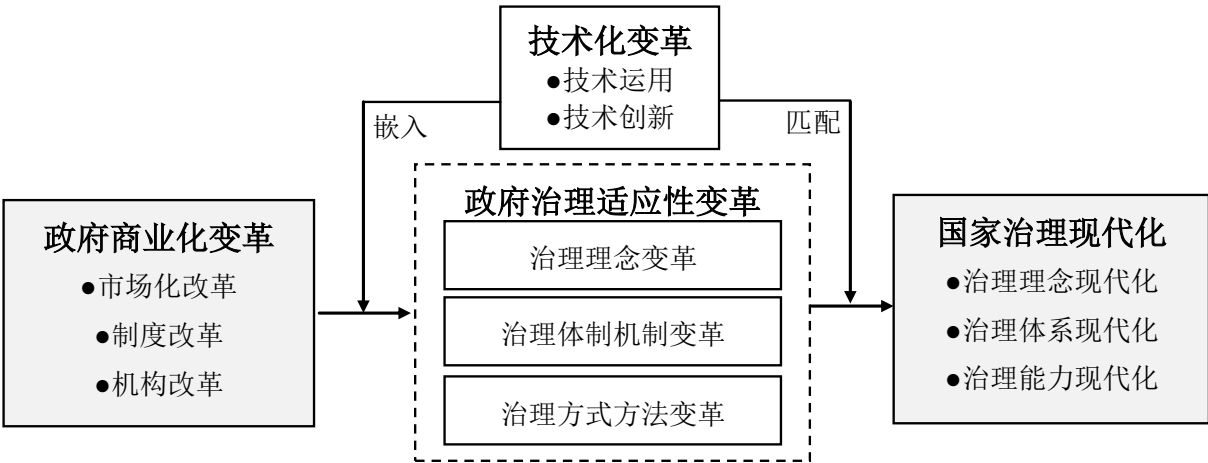


图 2 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机制模型

总之, 尽管马斯克的“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 但这场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随着技术化变革从嵌入到匹配的不断迭代和优化, 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有望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机制, 并籍助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的中间途径进一步促进了二者的协同耦合, 最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4.4 讨论

4.4.1 马斯克“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

马斯克的“百日维新”像一面照妖镜, 映照出权力、资本与体制的深层缠斗。从媒体分析来看, 马斯克“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纳为以下四点[14]:

- (1) 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改革措施直接触动了相关群体的利益, 关停众多机构和项目、大规模裁员, 导致政府内部员工面临失业或工作变动风险, 引发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同时, 改革也触及五角大楼、财政部等核心利益集团, 遭到了来自这些方面的抵制。
- (2) 引发社会质疑担忧。一些专家和民众担心大规模机构裁员和项目关停会影响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进而对普通民众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例如, 社会保障系统改革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也使得改革面临较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 (3) 面临法律权力限制。美国政府效率部 (DOGE) 作为特朗普总统通过行政令设立的临时委员会, 并非国会批准的正规联邦部门, 从成立之初就面临合法性争议。民主党参议员等人多次指控其“越权”, 并推动司法部调查马斯克是否利用公职为旗下企业谋利。此外, 特朗普也逐渐收紧了马斯克的权力, 使其推行改革时处处受限。
- (4) 商业帝国受到冲击。马斯克参与政府事务对其商业帝国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 SpaceX 旗下星链服务因俄乌局势陷入舆论漩涡, 用户信任度下滑, 特斯拉也因马斯克的个人形象问题遭受抵制, 品牌形象受损, 股价暴跌, 市值蒸发超千亿美元。这使得马斯克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重心和未来规划, 权衡在政府事务和商业之间的精力分配。

马斯克“百日维新”的初衷或许是打破政府治理的

官僚主义, 但其商业领袖的思维低估了政治改革的复杂性。首先, 他理想化了政治改革, 试图用商业化和技术化的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却忽视了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其次, “政治小白”的天真, 以为靠特朗普庇护就可以无视规则, 最终沦为两党斗争的牺牲品。此外, 马斯克个人的性格也不适合搞体制内的管理, 高调作风容易激化矛盾。总之, 正是因为对政府治理理论一窍不通, 也没有从政的实践经验, 马斯克才按照自己的商业化改革和技术化改革路径, 开展了一场以技术官僚思维重构政府治理系统的、疾风暴雨式的激进社会实验, 本质上是用商业化逻辑和技术化逻辑对政治生态的暴力解构, 最终决定了这场“百日维新”的成败。其实, 任何政治变革 (尤其是激进的政府治理变革) 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是一场马拉松赛, 而不是仅仅通过一次“百米冲刺”就能完成的。政治变革不仅要有变革的韧性, 更要坚持变革的长期主义, 提前做好风险管理和冲突管理预案, 并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 还要在变革中不断平衡和调整, 稳步推进, 只有这样, 才能最终实现变革的成果和变革的目标。

4.4.2 马斯克“百日维新”的价值和启示

尽管马斯克的“百日维新”以失败而告终, 但这场变革无疑对美国联邦政府未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首先, 它揭示了美国联邦政府治理的问题。暴露了美国政府存在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如官僚体系僵化、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部门之间缺乏协同等, 让民众和政府内部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为后续可能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其次, 它推动了技术应用和思考。引发了对于如何在政府管理中合理应用数智化技术的思考。其改革中尝试的数智化工具和跨部门协同机制, 为未来政府 in 提高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实践上, 马斯克的“百日维新”对国家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以下重要的启示。首先, 尊重政治生态复杂性。改革不能简单地将商业逻辑和技术手段照搬到政治领域, 需要深入了解政治体制的运行逻辑, 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和政治现实, 避免盲目追求效率而忽视了社会稳定和公共服务的本质。其次, 平衡利益与改革。改革要注重平衡各方利益, 不能过度触动既得利益集团, 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以减少改革的阻力, 提高改革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第三, 遵循法律和制度。改革必须在法律和制度

的框架内进行，不能以破坏现有法律和制度为代价来追求短期的改革效果，要通过合法的途径推动改革，确保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第四，重视公共服务特性。公共服务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不能简单地用商业绩效指标来衡量和管理。需要关注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质量特性，以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为根本目标。

4.4.3 图 2 中赋能机制的双向分析

图 2 的赋能机制模型，揭示了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单向赋能效应和作用。其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也有反向的赋能作用，可以促进政府的商业化变革和技术化变革及其协同变革。也就是说，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互耦合的，二者可以形成一个正反馈的双向闭环，只要假以时日，能够相互强化并相互改进。

5 结论

以马斯克“百日维新”为例，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本文探讨政府的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赋能机制，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

- (1) 政府的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源泉与核心动力。其中，商业化变革通过市场化改革、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三个方面来设计自己的行动策略。通过市场化改革，解决政府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管理质量问题；通过制度改革，解决政府管理制度机制问题；通过机构改革，解决政府组织机制问题。而技术化变革是基于技术运用和技术创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政府治理的精准性和智能化水平。
- (2) 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赋能作用是藉助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的中间途径来实现的。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促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水平，而技术化变革（从嵌入到匹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协同作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自己政府的实际情况，开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商业化变革，促进政府治理适应性变革，然后再结合技术化变革（从嵌入到匹配）的协同耦合作用，最终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本文的研究揭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商业化变革与技术化变革（从嵌入到匹配）不断协同耦合的过程，丰富了政府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

- (3) 马斯克的“百日维新”本质上是用商业化逻辑和技术化逻辑对政治生态的暴力解构，它是一场以技术官僚思维重构政府治理系统的、疾风暴雨式的激进社会实验，为政府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理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观察样本。这场变革表明：在既有政治体制框架下，纯技术驱动的激进改革难以突破制度刚性和惯性。在 21 世纪的政府治理变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技术化变革或治理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价值，但它必须与商业化变革、政治变革甚至社会变革相协同相匹配，并坚持长期主义，才能达到预想的变革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单案例研究，本文的结论在普适性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的有效性依赖于该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文化场景和管理理念。其次，美国作为发达的国家，它在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方面具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先天条件。未来，可以根据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化与技术化协同变革实践，开展更为细致的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 [1] 周文彰. 数字政府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J]. 行政管理改革, 2020, (2): 4-10.
- [2] 吕同舟. 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逻辑与过程逻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 (5): 54-58+145.
- [3] 薛澜, 李宇环. 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职能转变：系统思维与改革取向 [J]. 政治学研究, 2014, (5): 61-70.
- [4] 胡宁生. 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市场和社会新型协同互动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 (1): 80-86+106.
- [5] 赖先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场景下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的构建 [J]. 党政研究, 2020, (3): 103-110.
- [6] Xia Z. The 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21, 42(2): 4-23.

- [7] 何斌, 赵楠, 何琴清, 胡卫敏. 管理模式转型视角的数字化管理适应性变革研究——以字节跳动为例 [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1(2): 29-36.
- [8] 丁元竹. 治理现代化呼唤政府治理理论创新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 (3): 37-42+129.
- [9] 马斯哲. 西方政府治理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J]. 现代经济信息, 2016, (22): 28-29.
- [10] 李娜, 曾维和. 从公民参与到公民治理——公众崛起时代西方政府治理理论创新及启示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0, 8(3): 69-75.
- [11] 史伟锋. 政府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J].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08, 10(S2): 19-21.
- [12] 景玉琴, 蔡甦琳. 政府治理理论的新进展及启示 [J].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3): 10-13.
- [13] 商庆军. 政府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J]. 华东经济管理, 2007, (2): 51-55.
- [14] 马斯克百日维新失败, 不体面退场, 应该如何评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1014706695407989&wfr=spider&for=pc>. 2025-05-02.

作者简介

何斌

1968年生,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 长期在高校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出版著作三部, 发表学术期刊论文近百篇.

E-mail: river2000@163.com

倪钢

1965年生, 教授, 博士, 曾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辽宁省企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公共管理、企业技术创新. 长期在高校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曾就职于东北大学、宁波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

E-mail: nigongnigong@sina.com

李泽平

1970年生, 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企业管理. 曾为广州安特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 广州思卡蓝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广东粤景集团副总裁, 东莞石龙镇镇长助理、东莞石龙工业总公司董事长助理.

E-mail: lizeping2004@sina.com

龚建桥

1957年生,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 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管理实验、人力资源管理. 曾就职于深圳市委组织部原深圳市高级经理评价推荐中心以及深圳市委组织部深圳经理学院, 设计主持实施深圳市国企经理职业化培训工程.

E-mail: bridgejq@163.com

何其恒

2001年生, 职员, 学士. 研究方向为背调分析、大数据分析. 主要从事人力资源背景调查分析以及大数据分析工作.

E-mail: linghengqian@outlook.com